做强平台，为中非经贸合作注入活力

贺文萍

核心提示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两年一届的中非经贸博览会，搭建起全方位、深层次交流和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的平台，湖南在对非深度合作之路上衔枚疾进、领先前行，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大胆探索与有益实践。

作为国家级对非合作平台，中非经贸博览会已永久落户长沙。日前，第三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宣布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于今年6月29日至7月2日在湖南长沙举办。在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中，湖南自贸区肩负着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战略任务。这一国家级对非合作平台的持续做大做强，正是湖南着力构建对非经贸交流合作长效机制的具体举措，无疑为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用“真”“实”“亲”“诚”4个字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策主张。10年来，中国秉持“真”“实”“亲”“诚”对非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同非洲国家构建了健全的合作机制和广阔的合作平台，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中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提质升级，中非关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迈入了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中非贸易规模稳步提升。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2.89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创历史新高。2022年中非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820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16.6%。2022年8月，首批非洲对华出口的鲜食牛油果，在肯尼亚利穆鲁镇的桑瑞普工厂完成打包装运，经海运抵达上海港后，装满四个集装箱的牛油果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中国对非投资强势反弹。仅2021年1至9月，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已超过2019年的同期水平。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合作继续巩固传统优势，承包工程的合同额连续2年保持增长。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50万个。中非“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工程，如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以及刚果共和国国家1号公路等项目，不仅为地区的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疫情期间为保证非洲地区的生产链和供应链畅通发挥了重要支柱性作用。

非洲市场前景广阔。与欧洲、北美等发达地区相比，非洲市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工业化水平较低，有很多空白领域，有些非洲国家，连矿泉水生产线都没有。同时，非洲又拥有多元的消费市场，高端和低端市场同时存在，意味着企业的发展定位可以更加多元，产品体系可以更加丰富。非洲劳动力成本也比较低，矿产资源等比较丰富。这些年，因为抓住了中非经贸博览会这个大平台，湖南一跃成为推动中非经贸合作的先行军，成为中国对非经贸合作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

中非经贸博览会这个国家级平台，成就了湖南对外开放的诸多亮点，成功开辟了湖南发展新的增长点。依托湖南自贸区长沙片区，湖南在长沙高桥大市场建设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打造永不落幕的中非经贸博览会。埃塞俄比亚咖啡、琳琅满目的非洲宝石、卢旺达干辣椒……一站购齐非洲“特产”。越来越多非洲产品走进中国市场之时，湖南的装备制造、能源矿业、路桥房建、农业等优势产业也走进非洲，杂交水稻、工程机械等技术和产品享誉非洲大陆，正实实在在为非洲发展赋能。数据显示，2021年湖南对非贸易实现403.9亿元，比2012年增长了1.6倍，总量居全国第八、中部第一。2022年全省对非进出口实现556.6亿元，增长42.8%，再创历史新高。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10个年头。拥有丰富资源、巨大市场潜力以及强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把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视为自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希望通过抓住这一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实现其经济从前工业化社会到全面工业化的跨越性发展。截至目前，53个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52国以及非盟委员会已经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非洲已成为“一带一路”合作最重要的方向之一，中非基本实现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全覆盖。近三年里，虽然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但中非“一带一路”合作不仅没有按下“暂停键”，相反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并继续向前推进，“一带一路”所包含的政策通、贸易通、设施通、金融通和民心通等“五通”合作都在克服疫情挑战有序推进，给非洲各国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

相对于前两届，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规模更大、活动更多，将产生的成效必定更加显著。即将于今年6月举办的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据悉将设8个非洲主宾国和山东、湖北2个主题省。经贸产品的展区展览面积将达约9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2.7万平方米，还将如往届一样继续发布《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并首次发布中非贸易指数，为中非经贸经营主体开展合作提供“晴雨表”和经验分享。同时，将着力在“博”“贸”“产”“服”4个字上做文章，让更多的中非优质产品展示出来，并做好匹配服务，在物流、金融、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支撑，一步到位将博览会打造成为中非产品的集散交易中心。在高端论坛方面，本届博览会还将首次安排6场由国家部委(机构)牵头主办的论坛活动，主题既涵盖传统的基础设施合作、中医药经贸，还包括国家卫生、妇女权益这样的社会主题，将进一步提升平台的影响力。

努力把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变成绝对优势的产品，是现代国际贸易高端化的一大特征。在对非经贸合作上，湖南除了把已有的中非经贸博览会平台做强做大之外，还有两个显著的主打优势能够更宽范围更深程度对接非洲市场：

一是机械制造业对接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经常说中国方案、中国标准整体出海，必须要沉淀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得用到盾构机等重型机械。湖南的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都是国际工程机械行业中的知名品牌，其产品随着基建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积累更好的品牌口碑，是一个多赢的良好互动。

二是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可以助力非洲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帮助非洲解决粮食危机、食品短缺问题。湖南具有不可比拟的种业优势，可以申请纳入国家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体系，基于优势产业牵头承办相关合作项目；也可以依托自身优势、发挥资源禀赋，进行农业技术示范或者农业合作农场项目建设，不仅能给当地政府解决民生问题，也能为当地农民增收。在互利互赢的经贸交往中，湖南本省的农业机械、种子、化肥等农业领域物资都能跟着出海，收获更大的平台。

2023年，中非合作在继续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减贫惠农、贸易促进、投资驱动、数字创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九项工程”的基础上，将重点依托数字经济、健康经济、民生经济、中小企业来增强转型活力，特别是深挖数字经济的合作潜力。近年来，非洲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旺盛，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非数字经济优势互补，中国互联网企业可以大力开拓非洲市场，使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子商务成为中非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前，针对非洲国家外汇短缺、中国企业收汇难问题，湖南省对非易货贸易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并在2022年1月推出了中非易货贸易服务平台。今年，湖南省中非经贸数字化服务基地揭牌成立，未来将助力中非经贸合作中的数字化及信息化能力建设，同时，还将帮助部分非洲国家建设更加完整和高效的支付系统。今后，湖南还可以更好地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探索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国际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约研究员）

打造中非法治合作新机制

廖永安 常芸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强调，中非“应继续加强法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已连续13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中非经贸合作正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这对中非法治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湖南在打造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过程中，对新时代中非法治合作进行了有益探索，应进一步发挥传统优势，为打造中非法治合作新机制，助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湖南智慧”。

新时代中非法治合作机制，包括优势互补的法治交流机制、双向互通的涉非人才培养机制和全链条的争议解决机制。法治合作机制既是深化中非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也是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的前提。当前，中非经贸合作正向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发展，涉非法治人才供给与友好争议解决机制成为实现中非贸易良性发展循环的重要保障。中非法治合作新机制是法治与经济的互动机制，通过共商共建中非经贸合作规则，规范经贸合作行为；通过构建畅通的友好争端解决机制，维护经贸合作主体权利；通过打造中非法治人才双向培养机制，增强涉非法治人才培养的供给能力，为促进中非经贸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全面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对中非经贸合作的法治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法治合作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亟需破解，但目前中非法治合作存在涉非法治人才培养供给严重不足、中非友好争端解决机制不畅通的突出难题。人才方面，涉非法治人才以高校培育为主，培养规模小、周期长，难以满足急速上升的中非经贸需求；涉非法治人才缺乏实践平台，未与涉非企业、机构实现务实互动，理论与实务协同培育不足，服务中非经贸实践能力弱；涉非法治人才赴非交流比例低，对非洲国家二元化的法律体系和混合式的法律制度不清晰，对复杂的投资规则和司法程序掌握不充分，无法适应中非经贸法治化合作需求。与此同时，频繁的中非经贸交流，带来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纠纷，复杂的投资环境、衔接不够充分的争议解决机制，可能导致贸易摩擦扩大、贸易争端失控；中非商事调解机制尚未系统化搭建，调解规则、调解机构、调解人才配备缺位，调解非对抗性、高认可度、低成本的优势无法发挥，以仲裁与调解为核心的友好争议解决合力无法形成，不利于中非经贸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解决中非经贸合作的法治难题，应继续深化多边双边合作，加快构建以法治人才供给为核心，以畅通的法治交流为纽带，以全链条的友好争端解决机制为保障的中非法治合作新机制。

打造互联共通的中非法治交流机制。畅通中非法治交流，深挖非洲列国法律制度本源，掌握制度现实运行，是促进中非法律互鉴、制度共融和有效处理涉非经贸纠纷的关键。一是高质量的法治合作，需要高质量的对话平台。依托“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打造高质量中非法治交流对话平台，不断深化中非法治人才交流模式，拓宽学习互访、研讨培训、智库合作等务实合作渠道。二是高质量的法治合作，需要系统的人文交流。依托在非“孔子学院”，打造以法治人文交流为抓手的孔子学院高校联盟。联合已建立孔子学院的中国高校，形成以法治交流为核心的高校联盟，充分发挥区域性集合优势，以点带面推进中非法治人文交流和青年互动，协同传播中国法治故事、法治声音，以集聚中非民心，增进中非法治互信。三是高质量的法治合作，需要高质量的法治研究平台。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中非“法学会”，打造以中非经贸治理体系为核心的法治研究平台，凝聚非洲法律研究机构核心力量，把握非洲法律制度及配套司法程序的现实运行，全面深入开展中非贸易规则建设研究，补齐中非经贸发展制度短板，促进非洲国家国内制度与国际经贸需求的深度协调和重构。

拓宽双向涉非法治人才培养供给机制。优化涉非法治人才供给结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涉非法治紧缺人才，对于推进中非法治合作建设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保障性作用。首先，坚持人才持续驱动，推动建成多侧协同的高水平涉非法治人才培育体系。一方面，加快推进中非经贸合作促进研究会、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等平台建设，着重为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提供人才战略性支撑。另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紧紧围绕中非合作核心产业领域，构建涉非法治人才校企协同培育机制，在保障人才精准输送的同时，造就一批能力拔尖的涉非法律服务队伍。其次，开放性培养涉非法治人才，促进人才供给对接国家需求。“走出去”方面，充分发挥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效能，联合在非企业、法律实务机构，推进与非洲高校、企业及法律实务机构的双向人才培养，积极派遣师生赴非交流、走进在非项目，提高涉非人才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引进来”方面，要着力提升非洲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保障在非企业人才补给，帮助企业应对“本地化”用工政策。同时，联合中非高校强化中国——非洲法律研究中心和法律人才培训基地作用，为涉非法治人才供给持续赋能。

构建全链条的中非争端解决机制。中非经贸合作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摩擦化解的首要原则是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畅通非对抗式争议解决的“调解——仲裁”内外循环链，是形成中非友好争议处置合力的关键。湖南作为国家对非贸易先行区，应紧跟商事纠纷调解前置国际趋势，探索建立调解链接仲裁的一体化服务机制。一是打造对接中非经贸需求的专业化商事调解中心，完成机构规则的初始配置和人才的长效支撑。建立中非商事纠纷先行调解制度，对接双向法治人才供给机制，搭建“一国一调解员、一地区一调解委”的调解组织架构。让去过非洲的人参与非洲调解，让了解哪一国的人调处与哪一国的纠纷。二是增强调解力量，扩大调解主体参与范围，擢升调解信心，提高调解满意度。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在合作初期达成金融保险、企业等多方非诉解纷共识。同时加快编写“中非经贸争端解决指南”，引导纠纷解决首选非诉方式。三是创新“调仲结合”的线上综合处置平台，畅通对非经贸国内外纠纷解决渠道。以在湘涉非项目为核心，构建双边链接的纠纷处置平台，简化跨国商事争议处置程序，充分发挥调解优势，打破非诉解纷执行壁垒。

（作者分别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湘潭大学中非经贸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汇聚多方力量，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

缪燚晶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单元和最深厚支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构成，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环节。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基层治理现代化同样要围绕这一特质，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促进乡村振兴、建强城镇社区提供坚强保障。

纵观国外基层治理发展模式，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一是注重以法治化建设促进基层自治。如日本政府制定了《地方自治法》《城市规划法》等，美国政府制定了《住房和社区发展法》《国家和社区服务合作条例》《国家与社区服务信托法案》《社区再投资法》等多部关于社区发展建设和管理的法律规范，将基层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二是积极推动政府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如新加坡政府投入90%社区基础设施管理费用和50%的日常运作费用，当社会组织有能力和意愿承接政府部分职能时，政府会根据构建服务型社区标准，评估各社区组织业绩，以此为依据下拨活动经费，同时对投资社区的社会赞助给予支持。三是大力整合基层资源，构建多元协同的基层治理结构。为强化居民间情感交流并提升社区凝聚力，日本东京构建了住区居民、町内会、商店会、社会教育团体及地域活动团体等组成的社区公共事务共商平台。美国社区通过社区听证会、志愿者服务及丰富的街坊活动，满足社区居民生活与精神需求。

中国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有各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显著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障，通过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与明确规定基层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领导和基层自治的有机统一。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强调扎根基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都需要进一步扎根基层、做实基层、服务基层。中国的基层治理以人民为主体，将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统一起来，以基层群众组织为依托将自治、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以共同体为纽带将社区、村庄、城市、地区、国家等不同治理单元串联起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体系。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要以党中央关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共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基层治理体系为方向，建议重点从三个方面着力。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增强基层治理“战斗力”。近年来，湖南陆续出台《关于加强城市住宅小区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全域推进整体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等文件，旨在统筹组织资源、整合组织力量、发挥组织优势，着力提高全省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层治理任务重、标准高，群众身边的大事小情必须要有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要将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始终，让党的旗帜在基层高高飘扬，为基层治理指明前进方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统筹组织资源、整合组织力量、发挥组织优势，推行基层“党建+”治理模式，在各村(社区)建立以党组织书记担任召集人的村(居)民议事会，组织群众开展屋场协商、院落协商、小区协商等各类协商议事活动，实现民事民议、民题民解。强化业主自治组织中党员的带头作用，不断提升党组织联建共建工作实效，使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成效不断显现，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力量，使基层治理不断展现新面貌、新气象。

优化基层自治，大力提升基层治理“凝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治理主体作用。以搭建社区议事平台、促进居民参与为重心，将参与的理念落实到社会治理、公共空间更新和推进民生保障各方面，主动凝聚群众和引领群众，打造社会共治同心圆。开发“业主投票”微信小程序，引导业主大会规范成立，推动业主自治组织全覆盖。长沙云塘社区推出“开放空间”议事平台，长沙芙蓉区东湖街道推出“东湖夜话”活动，浏阳、宁乡、衡南、涟源等地基层党组织探索推行“屋场会”“积分制”……这些基层群众自治探索的新路子，能够助力形成群团组织助推、社会组织协同、人民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嵌入数字科技，持续释放基层治理“智慧力”。把数字科技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性新力量，加大“互联网+基层治理”新模式在基层应用，推动基层治理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深度融合，实现基层的系统化治理、精细化治理、高效化治理和主动性治理。广泛运用QQ群、微信群、社区论坛等形式组织社区活动、发起公共话题讨论。运用“网上群众工作云”把基层“治理”变社会“智理”，群众将诉求和困难反映到云平台上，管理机构采用“记者连线”“单位值班”“短信提醒”等“管家式”服务，快速即时问答，解决百姓难题，通过智慧技术应用，持续释放基层发展活力，有力促进基层繁荣稳定。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ZD010）】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

计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征程，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应多管齐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育人的方方面面。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效衔接。抓好第一课堂这个关键。通过课堂教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要求、内涵、本质和新的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根据学生学习生活特点、成长成才规律和高等教育规律，不断创新和改革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增强课堂吸引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第二课堂是课堂教学的重要拓展和延伸，打破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壁垒，将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融入式衔接、渗透式结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重要举措。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序联动。思政课要向高校学子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历史渊源和战略意义等，帮助大学生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价值理论等之间的关系。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能有效增强思想价值引领的效果。高校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之中，探讨各专业门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呼应的目标、规范和准则。

“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有机融合。融通线上与线下、贯通历史与现实，可以汇聚丰富开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人资源。面对“网络原住民”的“00后”大学生，高校需不断拓展互联互通的线上线下育人体系，建立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素材库；同时，应以现实为素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生动，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感召青年奋进新征程，让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成为当代青年最浓烈的情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高校学子的共同价值标尺。

“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青年要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高校要强化实践育人，建设和用好各类实践平台，引导学生融通理论与实践，深刻体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魅力和伟力。同时，不断运用生活场景、日常活动、具体载体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日常化、生活化、形象化，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与“行”相统一，引导学生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本文系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核心素养助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新域